

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梁太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梁太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 / 梁太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1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ISBN 7—5325—3868—0

I. 唐... II. 梁... III. ①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唐代②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宋代 IV. 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932 号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

梁太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5 字数 451,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

ISBN 7—5325—3868—0

K·633 定价: 5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 64063949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例言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 1897 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的相关学科。求是书院 1928 年发展为浙江大学,设文理等学院,1939 年文、理学院分设;育英书院 1914 年发展为之江大学,1940 年设文学院。1952 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它的师范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组建为浙江师范学院,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1992 年杭州大学成立人文学院。1987 年浙江大学复设中文系等人文学科,1995 年成立人文学院。1998 年 9 月 15 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1999 年 7 月,由原杭州大学人文学院、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大部分及原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人文学科有关单位合并组建的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

两浙自古人文荟萃,浙江大学地处杭州西子湖畔,环

境优美,是读书治学的好地方。近百年来,劳乃宣、邵裴子、宋恕、张相、马叙伦、陈去病、沈尹默、何燮侯、蒋方震、许寿裳、邵飘萍、邵元冲、梅光迪、钱穆、张其昀、贺昌群、张荫麟、钱基博、汤用彤、郁达夫、马一浮、丰子恺、谭其骧、林汉达、夏承焘、朱生豪、金仲华、王遽常、王驾吾、胡士莹、姜亮夫、任铭善、王季思、严群、陈乐素、沈炼之、蒋礼鸿、郭在贻等人文学科的著名学者先后在这里学习和任教,他们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的优秀人才,撰写了许多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研究论著,奠定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博雅求是、开拓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

新浙江大学及其人文学院的成立,适逢新世纪和新千年到来的时刻,它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也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发展新的起点。与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更重视积累,这是由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的。自然科学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现象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社会科学探讨的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人文科学关注的是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各门科学的研究领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但它们的分野基本上是清楚的。在这几个领域中,人的本质、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的变化最缓慢,也最微妙复杂。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日新月异不断变换相比,人文科学关注的始终是人类具有思想能力以来一直思考的那些问题,只不过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与世推移有所变

化而已。当代人对自然界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已远非早期的人类所可比拟,但我们很难说当代学者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的洞察已超越古代圣贤。如果把自然科学比作一列向无穷深邃的时间和空间隧道高速飞驰的火车,那么人文科学则有如一群人围绕着旋转舞蹈的一座亘古不息的火堆。不同时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只是根据他所直接面对的现实和自身的独特感受,从不同的方位和角度,给这座火堆投去一根枯枝,抑或一片干叶,以使它永不熄灭而已。每个富有自省精神和责任感的人文科学研究者,都不免为自身智慧的有限感到惭愧,同时又为自己向这座火堆投献了它熊熊不熄所必需的一枝一叶而感到自豪。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的目的,就是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以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点细微然而坚实的积累工作。入选的著作篇幅长短不拘,唯求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符合学术规范。该丛书约请国内外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审,每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五种左右,近期书稿主要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四个列入“211工程”建设的学科中遴选,条件成熟时遴选范围将适度扩大。由方一新、卢向前、包伟民、沈松勤、张涌泉、廖可斌(按姓氏笔画为序)组成《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小组,张涌泉、廖可斌为召集人,负责丛书的编审

事宜。该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张晓敏等先生的支持,谨致谢忱。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小组

2001年3月1日

目 录

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	1
《壶关录》漫说·····	13
“别纸”“委曲”及其他——《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	22
薛史“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为什么“一般不再改回” ——对《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一点意见·····	43
《宋史·食货志》的史源和史料价值·····	50
《永乐大典》残存《长编》熙宁八年四至五月记事校读札记·····	92
《长编》点校本译名回改中存在的问题·····	109
《三朝北盟会编》许刻本卷首彭元瑞题识志疑·····	12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	13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	155
《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	171
《要录》自注的内容范围及其所揭示的修纂体例·····	206
《要录》库本避忌讳改考实·····	248
《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	311
《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 ——李心传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	342
张栻笔下的“舜臣抚干表兄”非李心传之父辨·····	374
金朝败亡历程的可贵记录 ——《话腴》“端平甲午”条所录金诗三首浅释·····	383

《续资治通鉴》王广渊、王广廉相混说辨析	400
《简明宋史》质疑辨误五十例	413
《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订补	447
附录 《长编》点校拾遗	469
引据文献目录	552
语词综合索引	573
后记	588

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 各纪的撰进时间

《资治通鉴》每卷卷首都有作者司马光的署名，署名之上则列有其结衔，如卷一的结衔“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包括了此卷撰进时司马光所具有的散官、本官（寄禄官）、差遣、勋、赐等各种职官名称。此外若另有职、爵、封、实封，结衔也将其一一列出。结衔大致随每代史（即各纪，如周纪、秦纪、汉纪等）撰进时司马光官衔的变化而变化，全书并不一致，而在今日，它却成了我们据以考定《通鉴》各纪撰进时间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四库全书》本和常见的丁巳（1917）涵芬楼排印本只留署名而删去结衔，显属欠妥。幸好今日最常见的1956年以来先由古籍出版社、继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保留了其底本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中这些形似冗赘的文字，便利了我们的探讨。

清末学者陈汉章在《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①中即已颇注意每卷的结衔，这对他所研究的诸子分修问题虽未必有多

^① 作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载《缀学堂初稿》卷四。

大帮助,但在据以考定《通鉴》定本之年上却是先行者^①。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张须(煦侯)《通鉴学》专著,也曾论及:“余考《通鉴》逐卷题衔,大都历数卷,或十数卷而辄易。以此知某卷为任某官时所辑……循逐卷之题衔而观之,则某时期中进程之淹速,与其功力之难易,皆可测知。夫温公辑此书,以何年进何卷,史传无征,而余得于逐卷书衔处比而知之,是亦研究之一快已。”^②虽然他注意所及仅只部分官衔,而考释也尚嫌粗略,但创始之功却不可没。笔者于受益之余,不揣浅陋草此短文,只是企图沿着他们的足迹再往前跨进一步。

周纪五卷(卷1-5)、秦纪三卷(卷6-8)

结衔: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

据《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三《讲筵》、卷五七《宰相不押班》、卷五八《司马光弹劾》,治平四年(1067)四月十九日丙寅、二十三日庚午,曾两次降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司马光权御史中丞”^③除命,至二十六日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

① 参考陈垣《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载《陈垣史源学杂文》,第47-51页。

② 引文据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之修订本,见第24页。

③ 侍讲,原文误作侍读。按,司马光自嘉祐七年五月丁未至治平四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先后以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兼侍讲,《长编》偶有误作侍读者,此即其一。

士兼侍读学士”。则司马光任权御史中丞的时间为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八日,约五个月。理检使例以御史中丞充,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七〇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记事载给事中王昉等奏,即曾提及:“本朝天圣七年始制匭函,专命御史中丞为理检使,自元丰改官制以后,中丞衔内始不带理检使。”本官右谏议大夫前衔已见,其余散官、勋、赐当亦始于就任权御史中丞以前。则今《通鉴》周纪、秦纪共八卷的撰进时间即在此任权御史中丞的五个月间。

《通鉴》的撰修是治平三年(1066)四月十八日辛丑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正式开始的。此前,作为样本,司马光“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英宗之命,即是“令接所进书八卷編集”的。^①但从结衔来看,今《通鉴》前八卷已非治平三年样本之旧,“盖奉敕后又重为修正者”。^②

汉纪上·前汉部分三十卷(卷9-38)

结衔: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兼侍讲、同提举万寿观公事、兼判集贤院、上护军、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徐度《却扫编》卷下:“翰林学士,祖宗时多有别领他官如开封

① 《长编》卷二〇八。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资治通鉴》”解题:“初,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其起迄年限实与今《通鉴》前八卷同。

② 参考前揭《通鉴学》第24页。

府、三司使之类者，不复归院供视草之职，故衔内必带知制诰，则掌诏命者也。”司马光就任权御史中丞前已任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卸任后仍任翰林学士，皆例带知制诰，此所书，究系任中丞以前的结衔，还是卸任后的结衔？上揭《长编本末》权御史中丞除命，其前衔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而复任翰林学士除命所书则是“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今结衔所书既为“兼侍讲”而非“兼侍读学士”，当是任权御史中丞前的官衔。

另，据《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二“诰册恩命”所载司马光《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学士敕》，其前衔为：“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其中爵（河内郡开国侯）、封（食邑一千三百户）两项为周、秦纪八卷结衔所未列，实亦任权御史中丞以前所原有。因为按照宋制，只有经“恩”才能增加封户，封户达 1000 户以上才封开国侯^①。而在司马光任权御史中丞的五个月间，却并未举行过能使文武官加恩的郊祀、明堂一类大礼。

至于兼判集贤院。当时集贤院与昭文馆、史馆合称三馆，总为崇文院。《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〇：“初，昭文、集贤学士、史馆修撰，取最上一员判馆、院事，今亦以他官分判。”据《通鉴》书末所附《进书表》，治平三年英宗命司马光編集历代君臣事迹，“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既然书局设在崇文院，又许借三馆等处书籍，则同时命为判三馆之一的集贤院，也是很可能的。

惟同提举万寿观公事始于何时未详。

而司马光之始任翰林学士，据《长编》卷二〇九，其除命颁于治平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甲辰，经一辞、再辞、三辞，四月十三日方始

^① 见《宋史·职官志》一一、一二。

就任^①。而到四月二十六日癸酉,他就接受权御史中丞的官诰了。

按照以上分析,则汉纪六十卷中的前汉部分三十卷,其奏进的时间实早于前面的周、秦纪八卷,是治平四年(1067)四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这十余天内的事。司马光在《辞免翰林学士上殿札子》中曾言及,“近方欲具所修前汉纪三十卷先次进呈”,也透露了他在就任翰林学士前夕,前汉纪三十卷业已全部撰定,只待奏进的事实。

汉纪下·后汉部分三十卷(卷 39—68)

结衔: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判尚书都省、兼提举万寿观公事、上护军、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上揭《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二所载《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学士敕》:“可特授依前右谏议大夫、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知制诰,散官、勋、封、赐如故。”末署“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与前揭《长编本末》所系九月二十八日癸卯,有四日之差。所列诸衔,除“判尚书都省”外,余全同。“判尚书都省”非此时一并任命者,始于何时,容俟续考,但肯定当在此次任命以后。

魏纪十卷(卷 69—78)

结衔:前二卷(卷 69、70)同上。后八卷(卷 71—78)为:翰

① 此据《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三七《辞免翰林学士上殿札子》题注。

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判尚书都省、兼提举万寿观公事、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其中卷72勋仍作上护军，疑误。）

与前相较，不同处在于勋由上护军改为柱国，另又增食实封二百户。这是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郊祀加恩的结果。其《自翰林学士加柱国食实封二百户敕》今存，见《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二。谓司马光“早以儒学，跻于近列，谏垣宪府，向多开陈，经席禁林，居有撰述，属兹郊庙之事，乃眷侍祠之勤。宇内庆流，岂后恩典，遂进勋等，仍衍食封”。下署“熙宁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司马光就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前夕，在《乞免翰林学士札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中曾说：“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圣旨令读《资治通鉴》，其书卷帙尚少，须日近接续编修，史籍烦多，恐难以应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学士一职。伏蒙圣恩宣谕，但令权免学士院文字。”^①《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三《编修通鉴》亦载：治平四年十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诏五日一直。修《资治通鉴》故也”。此时“接续编修”的当即后汉纪，尚处于刚着手未久的情况。观魏纪前两卷结衔与后汉部分全同，或者后汉纪与魏纪的撰定虽略有先后，但却基本同时，且又同时奏进，而其时间则在“遂进勋等，仍衍食封”的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前后耶？

^① 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一。

晋纪四十卷(卷 79—118)

结衔:卷 79—108、110、115—118 共三十五卷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其中,卷 89“翰林”、卷 104“充”、卷 107“朝散”,字皆误脱。)

此结衔,仅散官、本官、爵、封、赐与前同,余皆与前异。

《长编》卷二一五载:熙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癸丑,“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司马光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又,庆历以后,凡自翰林学士出者,例皆换侍读学士,见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司马光此时即沿此故事,虽出知永兴军,亦仍带翰林侍读学士。

《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辛酉“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条记事:“光乞辞许州,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李焘自注:“留台得请,乃四月十九日癸酉,今并书于此。”

《苏轼文集》卷十六《司马温公行状》:“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自是绝口不论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至熙宁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所谓“以祀明堂恩”,当指熙宁四年九月的明堂加恩。据《春明退朝录》卷上:“每大礼,两府加恩,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内得三种;学士至待制、大两省,得阶、勋而下二种。”此次明堂大礼加恩,司马光如熙宁元年郊祀例,亦可得两种,则食实封之由 200 户增至 400 户,当与勋自柱国加至上柱国同时,即熙宁四年九月的事。

此后，熙宁七年十一月郊祀加恩，司马光的食邑由 1300 户增至 1800 户，食实封由 400 户增至 600 户。

依据以上考察，晋纪中此三十五卷当撰进于熙宁四年（1071）九月以后，熙宁七年十一月以前。

晋纪中的其余五卷，卷 109、111、113 的结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赐紫金鱼袋”，与下宋纪至隋纪同。其中食邑“一千”，卷 109、111 误作“二千”。卷 112、114 的结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实封九百户、赐紫金鱼袋”，与下唐纪同。陈汉章谓：“《通鉴》一百八十五卷前间有题‘太中大夫’者，与前后卷不符，当由是年重修之故。”^① 良是。然重修者实不限于“太中大夫”与前后卷不符诸卷，若卷 109、111、113 三卷，亦属业已与晋纪其他各卷一并奏进，而又调出重修者之列。

宋纪十六卷（卷 119 - 134）、齐纪十卷（卷 135 - 144）、梁纪十二卷（卷 145 - 166）、陈纪十卷（卷 167 - 176）、隋纪八卷（卷 177 - 184），共六十六卷

结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

^① 见前揭《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